

延安时期 统一战线问题研究

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延安时期 统一战线问题研究

师 锐 李忠全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问题研究/师锐等主编.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0

ISBN 7—224—05396—1

I. 延... II. 师... III. 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工作—研究 IV. K265.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2087 号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问题研究

师 锐 李忠全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西安市建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75 印张 239 千字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24—05396—1/K · 896

——
定价: 13.00 元

序

高宜新

1999年12月10日

由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和陕西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联合编撰的《延安时期统一战线问题研究》(下称《研究》)一书，是一部史论结合、以史为鉴、服务现实的佳作。它的出版发行，对于深入研究这一时期党的统战理论与政策，更好地贯彻执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理论很有促进作用。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中共中央从1935年到1948年，以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和总后方，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13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并为全党在各个方面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研究》一书的问世，是统一战线工作成功经验的真实写照和科学总结。今天，研究和学习延安时期统战工作的历史经验，为指导新时期统战工作提供借鉴，很有现实意义。延安市委统战部和省陕甘宁根据地史研究会的同志们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我在革命圣地延安工作多年，对延安的历史和现实有很深的感受。看了《研究》一书的书稿后，觉得确实很有特色。

一是理论性强。《研究》一书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条主线，即论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通过论述中共中央

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的统战思想、理论和实践，充分反映出他们各自的特点和风格，同时具体展现出陕甘宁边区领导人林伯渠、李维汉、王观澜等在贯彻我党统战政策、策略工作中的活动与建树，尤其是西北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等，早期在创建和巩固根据地时在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政策方面，很有成就。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今天很好地继承和发扬。

二是着重于实践应用。《研究》一书，在论述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政策时，从大的方面论及了党派政策、外交政策、土地政策、对敌军和友军工作的政策等，同时，以大量的篇幅阐述了统一战线政策在各条战线上的广泛应用及其实效。一方面通过关中、三边、陇东、延属、绥德5个分区的具体统战工作实践来反映统战政策是如何实施的；另一方面反映了统战政策在政权建设、民族宗教、文化教育、华侨，以及对知识分子等项工作中是怎样贯彻的。该书融理论、事实、政策、实践于一体，使人读后感到延安时期党的统战工作是有声有色，是实实在在的。

三是《研究》一书歌颂了一批长期在边区从事统战工作的干部的光辉业绩。如习仲勋、马文瑞、汪锋、孙作宾、吕剑人等，他们在极其恶劣的环境里，在曲折复杂的斗争中，默默无私地为党工作。特别是长期处在敌占区的，更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创造出惊人的奇迹，为贯彻执行党的统战政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正是中共中央统战政策在陕甘宁边区的成功运用，才使国民党保六团、新十一旅与骑六师的起义先后获得成功。

我相信，该书的出版，定能发挥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作用，对新时期党的统战工作和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亦具现实的积极的意义。

目 录

序	高宜新	(1)
一、中共中央、边区领导人的统战理论与实践		(1)
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		(1)
刘少奇统一战线思想述要		(13)
周恩来统一战线的思想与特点		(24)
林伯渠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贡献		(34)
李维汉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论述		(43)
王观澜在边区的统战工作		(54)
刘志丹在统战工作上的贡献		(64)
习仲勋与陕甘宁边区的统一战线		(76)
二、延安时期的重要统战政策		(86)
党派政策		(86)
党外人士的政策		(97)
外交政策		(108)
党对私营工商业及延安商会活动的政策		(120)
对待友军工作的政策		(128)
对敌军的工作政策		(139)
党对哥老会的政策		(150)
三、统一战线区域研究		(160)
三边分区的统战工作		(160)

陇东分区的统战工作	(176)
关中分区的统战工作	(181)
绥德分区的统战工作	(194)
延属分区的统战工作	(207)
四、各条战线中的统一战线	(213)
政权中的统战工作	(213)
抗战时期土地问题中的统战工作	(224)
对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	(236)
党对民族宗教上层的统战工作	(248)
时华侨的统战工作	(257)
文化教育中的统战工作	(266)
五、统战回忆与资料	(277)
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回顾	马文瑞 (277)
我赴陕北苏区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	
工作与给孙蔚如转交信件的经过	孙作宾 (285)
关于统战工作的回忆	吕剑人 (292)
新编十一旅的安边起义	(302)
保安六团三大队的反内战起义	(316)
横山起义与骑六师成立	(323)
后记	(338)

一、中共中央、边区领导人的统战理论与实践

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

一、时代三特征

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革命和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毛泽东做出了杰出的理论贡献。因此，研究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无疑对于解决当前国际国内重大问题，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任何一种思潮的产生，都有它的历史根源和时代背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与所处的时代特征有关。

(1) 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思想，已经在理论上作出精确概括和阐述，成为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理论基础。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

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① 所以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时，必须争取、团结一切可以争取、团结的力量，在一定的共同目标下结成联盟。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他认为，无产阶级要战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需要尽最大的力量，联合广大的同盟军。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指出：“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要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本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另一方面更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临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② 也应当加以争取和利用。在“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思想指导下，列宁曾派代表到中国，支持孙中山与共产党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中国大革命的发展。

(2) 中国处在大动荡的年代。1840 年的鸦片战争，破坏了中国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种社会的特点是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封建剥削结合。帝国主义和中国的买办势力相勾结，剥削的残酷性更加严重，使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随着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革命的任务主要是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封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 5 月版，第 262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 10 月版，第 225 页。

势力对中国的统治，即反帝反封建。中国人民不甘屈服和落后，革命斗争前赴后继，太平天国革命、中日战争、中法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表现出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数千年的封建制度，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并没有解决。

(3) 中国的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国内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加上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促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个对立的阶级，在相同的时间和环境中得到产生和壮大。在民族矛盾和阶级压迫日益深重的时代，各种社会思潮和流派，在激烈的斗争中传到中国，其中代表先进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思潮逐步成为主流，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无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威力，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正是在这种革命理论、时代背景、阶级基础三个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产生和形成的。并成为中国人民在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时期，夺取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的法宝。

二、思想萌芽三渠道

探讨毛泽东统战思想的萌芽，有三个主要渠道。

(1) 实践出真知。毛泽东出身于农民家庭。勤劳、朴实、团结友爱、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优秀品质，是从他的这种出身带来的。因此他在上学期间，勤奋读书，善于思考，较早地探索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从考入县高等小学就立志：“学不

成名誓不还。”^①当时的中国正处在黑暗的时代，外国列强的瓜分和封建剥削，使人民饥寒交迫。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正在寻求救国救民的良方。在实践中使他认识到，欲完成驱除列强，推翻封建官僚统治，走强国富民之路，必须广泛联友，只靠少数人是不行的。1915年，毛泽东就提出“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人非圣贤，不能孑然有所成就，亲师而外，取友为急。”^②后来他以“二十八画生”为名，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提出结交刻苦学习，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1918年4月，经过与友人反复讨论，确定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达到共同活动和团体的生活追求，组织建立起新民学会。其目的在于：“谋内外之联络，通新故之情素，图理论与经验之结合”。据毛泽东回忆：“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③不久，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湖南省学联刊物《湘江评论》。他为创刊号撰写长短文20多篇。文章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表现出强烈的革命热情。他指出：“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大联合的力量最强。”^④随后又写了《民众大联合》一文，在《湘江评论》上连载三期。文中指出，民众大联合是当今中国思想解放，政治解放，经济解放，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文章发表后，在思想界引起很大反响，北京的《每周评论》称赞，文章眼光远大，议论痛快，确是当今的重要文字。他还在致新民学会员的信中指出：“我们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办法就是“共同讨论”，“目的讨论好了，再讨论方法怎样实践。要这样的共同讨论，将

^{① ② ③ ④}《毛泽东年谱》第1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4月版，第8页、第18页、第36页、第42页。

来才有共同的研究，共同的准备，共同的破坏，和共同的建设。”^① 后来，毛泽东在组织湖南自治运动中，提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问题，由小联合达到大联合。湖南的自治，应当确定一种大家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大气候的。“主义比如一面旗帜，旗帜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② 1920年11月，在给友人罗学瓒的信中提出：“同盟组成了，同盟的各员立刻组成同盟军。”^③ 在实践中，使毛泽东联友、结盟、组织同盟军的思想得到不断升华。

(2) 马列主义启迪。马克思主义学说，揭示了一切阶级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及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阶级斗争的策略，给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1918年8月，毛泽东到北京，经他的老师杨昌济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馆员，得到李大钊的指点，阅读了马列主义书刊，参加北大学生研讨各种思潮的活动，有了广泛的社会接触。第二年毛泽东又到北京。据他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其中的“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④ 1920年7月，毛泽东在《大公报》发表《发起文化书社》一文，认为现在全

^{① ② 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464页、第554页、第567页。

^④ 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79年12月第131页。

世界、全中国都没有新文化，只有北冰洋岸的俄罗斯，有“一枝文化小花”^①。接着又发表《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文章指出：四千年的大中国，只是形式的中国，没有实际的中国，因为没有基础。中国与俄国不同，俄国革命所以成功。中国目前还不具备这种条件，于是他通过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拟定派人赴俄学习计划；出版发行俄罗斯丛刊，宣传十月革命，扩大政治影响。

(3) 吸取别人的智慧。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得到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启发和引导。毛泽东曾称赞“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思想界的明星”。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陈独秀当时任北大文科学长。他回忆说，“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所以，1919年7月，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北洋政府逮捕入狱后，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立即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揭发反动当局罪行，高度评价“陈君至坚至高之精神”和功绩。1920年3月，在上海，毛泽东与陈独秀等联名在《申报》上发表《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事》，“求得教育与职业合一，学问与生计合一”。他们还讨论过湖南改造促成会的计划，阅读马列著作以及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事宜。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曾提出，“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和李大钊起了很大作用，《新青年》杂志使许多人警醒起来，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毛泽东称李大钊“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

^① 《毛泽东年谱》第1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4月版，第62页。

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①。这是因为他北大期间，曾得到李大钊的热切关注，指导他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高度重视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在社会改造的许多重大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如国共合作，对待中国的农民问题等。

三、思想形成三阶段

在建党之前，毛泽东刻苦学习并经历了广泛的社会实践，掌握了不少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知识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与同时代知识分子有多方面的接触，得到多方面的锻炼和提高。因此，毛泽东已经被不少有知识之士视为中国未来的栋梁之才。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他是出席代表大会最年轻的成员之一，可见其声望和地位的显著。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他进一步认识到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把“联友”、结“团体”“大联合”，处于统一战线萌芽状态的思想意识，提高到探索建立党的统一战线策略的高度来认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从萌芽到正式形成，经历了比较长的实践过程，它是随着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不断发展而发展的。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1) 毛泽东和党内同志共同探索的阶段(1921—1927)。建党初期，“一大”确定了党的奋斗目标和任务，但是当时还提不出完成革命任务的斗争策略。而且在决议中规定，党要站在独立的立场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提出“彻底断绝与

^① 《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下册)，红旗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627—628页。

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关系”^①。事实是，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国内外反动势力相勾结，残酷的掠夺、压迫、剥削更加严重。形势迫使共产党人必须回答中国国情、革命性质、革命对象和斗争和策略等最基本的问题。1922年党的“二大”，作出《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提出实现民主革命的纲领，必须采取联合战线的策略，提出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②把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作为建立联合战线的主要对象，改变了“一大”孤军作战的方针。正是在这个时候，孙中山接受了以阶级分析的观点，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中共开始探索国共合作的问题。1923年6月，党的“三大”，正式确定国共两党合作。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在会上发表了拥护共产国际的决议，主张建立国共两党的反帝反军阀的统一战线。党的统一战线方针的确立，引起许多同志的重视。邓中夏在《我们的力量》一文中提出，“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是农民，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基础。”所以，与民族资产阶级共同行动（联合战线），应以不破坏农民中的工作为限度，过此限度，便有与民族资产阶级分道扬镳的可能。毛泽东正是在集中党内探讨革命策略意见的基础上，发展了过去“大联合”的思想。1923年4月，他在《外力、军阀与革命》一

^{①②}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册，军事政治学院内印，第197页。
第496页。

文中指出，由于反动势力之强大，国共两党必须合作，这样民主派分子是一天一天增加，组织一天一天坚固。结果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中国的民主独立政治在这个时期才算完成。在《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中指出，统一战线是革命成功的保证。在帝国主义和军阀两重压迫革命的环境里，全国的商人、工人、农民、学生、教职员乃至各种各色凡属同受压迫的国民，应建立严密的联合战线，这个革命才能成功，有了中共党内的这种思想基础，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才能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才能通过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决议。到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时，200多名代表中，共产党员占到1/4，形成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结成的统一战线，战胜国民党中的右派分子，使大革命不断向前发展。在创建黄埔军官学校，农民运动讲习所，发动和组织工农中做出重大贡献。经过这个阶段革命的实践和探索，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毛泽东写出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重要著作，标志着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产生。因为在这些文献中，对中国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对革命的态度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提出领导权和同盟军问题；指出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反帝反封建是革命的主要任务；论述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明确指出中国民主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农民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

(2) 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充实完善的阶段(1927—1935.1)。大革命失败，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破裂，革命遭受到严重损失。这使共产党人不能不思考其中的深刻教训和将来的出路，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同盟军的分裂，蒋介石、江精卫

屠杀政策激起共产党内的急躁情绪，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作为打击对象。在这革命的生死关头，毛泽东高瞻远瞩，对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①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没变，“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既然是民主革命，对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做出正确的阶级估量，确定正确的斗争策略，分清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该争取的同盟者，哪些是要打倒的敌人。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党内出现过三次左倾错误，一次比一次“左”，到了王明路线统治时期，认为中国革命，“已经不但要进行残酷的斗争反对封建残余、反对军阀制度、反对帝国主义者，而且要同时进行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无情斗争。”^② 致使根据地在政治经济上受到极大损失。针对这种错误，毛泽东指出：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私人经济，不待说，现时是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在相当长的期间也必然还是优势。依照这种指导思想，毛泽东在中央根据地制定了依靠贫农和雇农，联合中农，保护中小工商业，消灭地主经济，给富农以经济出路，包括一般地主也给生活出路，纠正“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版，第47页。

② 博古：《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的经济政策》，《斗争》杂志，1937年4月。